

功能的問題，作者此處之論述則略顯單薄。

最後一章探討了蘇州城市建築的「風水觀」問題。作者的基本觀點是：在理論上，「風水」可運用於各種建築中，然而在城市建造實際上的運用則相對較少，而且對城市整體構造的影響比對小範圍的空間布置要小。

基於後面諸章之論，作者認為，所謂城牆形制的長期穩定與城市空間擴展的「矛盾」現象，其實正反映了帝制時期中國城市的特質和地域社會特有的城鄉聯繫。在導言中作者也已闡明對這種「特質」的理解：城市在狀態、準則和象徵功能方面具有某些共同特徵，同時又因內部格局和形式、特殊的歷史事件以及政治和經濟的地位而產生不同程度的差異。這啓示我們要把對城市建築傳統的探討置於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在動態的社會過程中揭示其差異和聯繫。

或許也正是由於作者力圖通過建築形制變遷來解釋城市史研究中眾多「矛盾」問題的急切願望，使得全書在一些關鍵的理論對話中似乎有岔開話題之嫌疑，譬如上述從「需要」的角度討論公共空間的存在。另外，在探討具體建築形制的同時，作者嘗試探討建築的符號意義，但若將其推及古代城市史的普遍特質時，則須考慮作者本身也強調的時間和空間的差異問題。例如近來有學者在研究中認為，在宋代至明中葉長達五百年的歷史中，城市沒有城牆或者城牆處於頹圮狀態可能是城市城牆的常態【參見成一農，〈宋、元以及明代前中期城市城牆政策的演變及其原因〉，載〔日〕中村奎爾，辛德勇編，《中日古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蘇州城牆的長期穩定或許仍屬特殊。無論如何，這部著作提出了一個如何運用建築史視角來提出和分析中國古代城市史中諸多重要問題的研究方法，並將之付諸具體實踐，這無疑是其最大的學術意義所在。

謝湜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杜正勝，《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臺北：三民書局，2004年，2，2，403頁。**

在過去半個多世紀的學術建設之中，現代臺灣史學界擊起了令人矚目的「新史學」大旗，無論從組成的核心人員、學術資源還是取得的學術成果而

言，都閱歷了史學發展的風風雨雨。從「完成自我」到「推動風潮」，從政治社會之實務到思想文化之薰陶，杜正勝先生完成了一系列遠超自我的理念昇華，以「溫情脈脈」的史學敬意向臺灣歷史文化研究致以一個縱覽的句點。

《新史學之路》、《藝術殿堂內外》以及《古典與現實之間》等一系列叢書（包括舊作新刊的《詩經的世界》、《中國文化史》等等）的問世，不僅僅是杜正勝近十年來學術思考的成果，也是其歷史研究理念經由教育落實、並以一個本土栽培的歷史學者為本位的脈絡追尋。正因為「新史學」之定義廣泛，唯有不斷求新、反省以及改善，才能夠造成溫和的、自主的史學改善運動。誠如作者開篇所言，「這是一個史學新視野對舊視野的革命，一個世界觀的革命，也是一個人生觀的革命，破除過去的牢籠，走出中國疆界研究歷史。」此書之宗旨一方面在忠實記錄新史學運動發展的軌跡，另一方面也為未來之臺灣史學發展提供了可資參考的方向。

《新史學之路》共分作四編，主題皆圍繞此「路」之雛形、發展、成長的經過：「方向之探索」既是回顧也是展望，總結了作者以及臺灣五十年來的學術理念發展；「前賢的鏡鑑」乃是作者追勉的個人學術史，當中所涉學人皆是近代史學史發展中的「典範」；「實踐與試驗」乃是群體創造的探索與經驗，更傾向於實務性的工作回顧；「學術與生命」收錄了作者這些年來的部份學術訪談和思想雜感，可作為前三編的補充，更足以瞭解一個學者思考的全部想法。這一編輯安排顯然不是無意的體例，更多的是「夫子自道」的價值觀徑向。

一編「探索」可謂是全書的重點所在，主要從縱、橫兩個方面論述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個人的學術之路追述以及思想觀念的幾個重大轉型。毋庸置疑，這首先都與史語所有着天然的密切關係。《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指出所歷經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乃是求歷史之真相的新史學運動，這在1928年傅斯年創辦史語所的工作旨趣中便已經明確提出，並且對二十世紀的中國學界影響極大，被奉為圭臬。這一點直至1950年依然為在臺的史語所所傳承；同期由於政權改易，分途轍轍，中國大陸、臺灣、海外漢學逐漸形成了不同的學者群落，在臺者乃是繼承了原來大陸史語所的學術傳統，一方面，杜正勝指出，臺大歷史系以沈剛伯先生為代表的學風探索，主張「史學反映時代精神」，此與史語所可謂「貌離神合」；另一方面，領軍人傅斯年先生的猝然離去使其理念在臺灣史學研究未

能產生實質的、可操作性的影響。第二個階段乃是許倬雲、陶希聖等在20世紀60年代引入了北美漢學的社會科學方法，包括風靡一時的計量和心態分析，創辦學術刊物，現世關懷濃重，雖然時間前後延續三十多年，影響了一批學者的史學方法改造和心史變化，但未及根本的路向轉移，不能稱之為革命性的轉變。歸根究底，此時的臺灣史學學界仍在傳襲而非創新。單純的社科人文、史學觀念相加，不但無所裨益，反而越發顯出方法的粗糙淺顯，遠真而近謬。杜正勝先生身處60年代之運動「高潮期」，考究學問之路卻與當時主流大異其趣，所寫的《周代城邦》等探究的都是廣義的社會問題，從社會基層平民庶眾的生活看歷史，這一思考已經奠定了後來研究的基礎：即歷史的「新」寫法。直至90年代成《古代社會與國家》一書之時，作者依然堅持「『社會』和『國家』是歷史發展的骨架，史學研究的主流。歷史學以探究人類群體行為為主旨，人類一旦開始經營有組織的群體生活便構成『社會』，組織日趨複雜，形成一定統治秩序，便達到所謂『國家』的階段」。

【杜正勝，《古代社會與國家》（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第三個階段恰是1990年肇始的「新史學」，即杜正勝在《創刊詞》中提及的：「嘗試各種方法（不論已用未用），拓展各種眼界（不論已識未識），以探索歷史的真實和意義。」觸及精神層面的「模糊史學」是模糊了歷史的邊界卻拓寬了歷史的寫法，因此也包含了臺灣本土學者——以中研院史語所為核心的中青年學者——前瞻、開放、嘗試的打破學科隔閡的探求態度。1992年杜正勝發表了〈什麼是新社會史〉，擬訂出具體的三個層面（範疇），從物質的、社會的、精神的要素作對個人與社會的整體探討，包括了十二點內容——這是在「社會」與「國家」的領域內進行「內延」和「外延」的擴展，「從更根本的生態資源出發」，自此十年內的工作已具備初步的成果了。從〈中國古代史研究——臺灣觀點〉、〈一個新史觀的誕生〉等一系列文章則可以體察到杜正勝關於第二階段的「新史學」的主要觀點，他始終保持着自覺的意識，並且力圖達致從學問到觀照社會的境界：一個具備學者風範的史家在面對現世需求與學術理念的抉擇境地時，該作何「回應」？「同心圓」作架構下包含的臺灣史／中國史／亞洲史乃至世界史的格局，乍看似乎是一個環環相扣的論證過程，但如果單純以史論圍囿史料，那麼這預設的論證就有可能製造了新的認知障礙，引起不必要的爭論，反而與杜先生之出發初衷產生了過遠的距離。誠如先生在文中所言，「史學家如何擺脫中國中心本位，把中國歷史從今日中國的疆域解放出來，拓寬領域，用整個亞洲大陸（或歐亞大陸）作基礎，對於中國歷史文化可能會有新的認

識」，但基於同樣的觀點，臺灣本位或者「臺灣經驗」的提法乃是一把雙刃劍，意欲「去中心」，也可能是「泛中心化」的範式試驗。因此如果新史學之路的最終落腳點在「同心圓」，反而有可能困於「圓」內。試問如何尋求與政治力抗衡的社會力，自我的學術本位又該如何獨立自成方圓呢？這或許是本書之外亟需回答的問題。

二編、三編可作互相補充的學術源流體察。二編是以個人學術史為中心進行的討論，所涉及的主要人物是傅斯年、沈剛伯、李濟、錢穆、高去尋這五位先生。他們都是臺灣史界最主流的典範人物，從傅氏獨創的史學革命，到傅、沈二位分途的史學觀點，及至各領域如考古學、古代史學和北方文化研究等，都是臺灣史界過去取得的重要成就。他們的研究歷程、思考所得和學術交遊，都深刻影響了臺灣史界的發展，也奠定了其發展的根基。從傅斯年的新史學（*Altertumswissenschaft*）開始，二十世紀的中國史學發展從理念到實踐都有了充分的注腳，無疑為後來提及的第二階段之「新史學」提供了借鑒作用。三編則追述史語所之機構設置以及出版刊物的理念完善，末篇〈新史學經營四題〉則經從學術運營來考察一所之「史」的建立，這可謂是史學定位中「作一時之見證」的史料記載了。四編之文章形式不拘一格，思想雜談形式為重，〈對待中國文化史的態度〉乃是呼應了所編著的《中國文化史》的內容，也是作者自身著書立場以及思考歷史教育的體現；〈夏史答問〉、〈徘徊於素書樓門牆之外〉為學術專論，〈學史的態度〉、〈歷史學家的職責〉以及〈追尋歷史的生命力〉既為對話亦是自道，對自身修養、職責所在、角色轉換都有到位的論述。這類文章含義雋永，對後學而言也增加了它內涵的厚重。

杜正勝先生曾經在中研院史語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中言及：「路，是人走出來的。漫山遍野的雜草，有人帶頭走出一條蹊徑，後人跟隨，便成為大道。」路由此啓，得失心知。傅斯年先生揭舉的「舊域維新」而創史語所，成就的是「新學術之路」的開創；而杜先生以及他的同事們所期許的「新史學之路」，在這十年的「小試牛刀」之後，會步入或者即將步入一個怎樣的新局面呢？拭目而待。

劉焱鴻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